

China:
Its
History
and
Culture



(插图第4版)

中國歷史與文化入門

(美) 斯科特·摩顿 (W. Scott Morton) 卢其敦 (Charlton M. Lewis)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China: Its History and Culture, 4e

中國歷史與文化入門

(美) 斯科特·摩顿 (W. Scott Morton) 卢其敦 (Charlton M. Lewis) 著
陈西帆 顾歆悦 译 陈荣捷 推荐

(插图第4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史与文化入门:插图第4版 / (美)摩顿, (美)卢其敦著; 陈西帆等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0.8

书名原文: China: Its History and Culture

ISBN 978-7-5100-2731-4

I. 中… II. ①摩… ②卢… ③陈… III. 文化史—中国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68639号

W. Scott Morton, Charlton M. Lewis

China: Its History and Culture, fourth edition

ISBN: 0-07-141279-4

Copyright © 2010 by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photocopying, recording, taping, or any database, information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This authoriz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jointly published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 and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SAR and Taiwan.

Copyright © 2010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 a division of the Singapore Branch of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and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版权所有。未经出版人事先书面许可, 对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或途径复制或传播, 包括但不限于复印、录制、录音, 或通过任何数据库、信息或可检索的系统。

本授权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麦格劳—希尔(亚洲)教育出版公司 and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合作出版。此版本经授权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销售。

版权©2010 由麦格劳—希尔(亚洲)教育出版公司与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所有。

本书封面贴有 McGraw-Hill 公司防伪标签, 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9-6833

中国历史与文化入门(插图第4版)

著者: (美)摩顿(W. Scott Morton) 卢其敦(Charlton M. Lewis) 译者: 陈西帆 顾歆悦

推荐者: 陈荣捷 筹划出版: 银杏树下 出版统筹: 吴兴元 责任编辑: 马春华

出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出版人: 张跃明

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北京朝内大街137号 邮编100010)

销售: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西芦城 邮编102612)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7.5 插页4

字数: 250 千

版次: 2010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教师服务: teacher@hina.com 139-1140-1220

投稿邮箱: onebook@263.net

编辑咨询: 133-6631-2326

营销咨询: 133-6657-3072 010-8161-6534

ISBN 978-7-5100-2731-4/C·114

定价: 28.00 元

(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10-61232263)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便有了长足的进步。美国各院校开设了比以往多得多的有关中国的课程。更多的人曾在中国生活或访问过。而且，更多的学生学习了中文。正因如此，他们可以通过直接材料了解中国，也可以近距离地观察中国。美国人的中国观，已经变得更加客观，更加公正。许多关于中国的陈词滥调已经消逝了，比如人们曾认为中国人不敬重生命，没有个人尊严，中国的科技一直处于落后水平，中文没有语法或某些表述，中国的家庭总是和睦的，中国人的措辞总是规规矩矩的，等等。

但是，对中国的真正了解，不仅要求与过去的陈词滥调分道扬镳，而且需要一个更为客观、公正的中国观。它要求人们具备一些关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基本知识，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中国是一个历史与文化的国度。中国有悠久的、有记载的历史，且中国人常回忆之。中国的事情，很少能与其历史分开。就意识形态而言，中国在 1949 年有一个大转变；但就其省、县的政治结构而言，已有两千年的历史。比如，当一个中国人谈论友谊的时候，他/她常会引用公元前 6 世纪的孔子之言。中国人之所以常回顾历史，并不是因为他们落后或者保守，而是因为他们能从历史中获得具体的例证及过去的经验。这与美国的司法系统有些类似，坚持引用成例来说明何以会作出某一判决。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是最具有历史感的民族之一。公元前两千年人们生活的细节、公元前 6 世纪人的对话、公元 1 世纪的书信，这些东西都保存了下来；而且，数个世纪以来，各地州县不断地将成千上万的地方志印刷成册。一般的中国家庭，可能会有过去一千年的传统记载，还会有一部回溯至少 800 年的家谱。因此，对于中国的任何一个方面，离开了其悠久的历史背景，都不可能求得真正的理解。有人认

为中国的历史只能纵向地理解一样，正如西方的历史只能横向地理解，这样的说法可能有些简单化了，但毫无疑问的是，历史的观点对于研究中国的任何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

同样不可或缺的是研究中国的文化。因为中国人在古腾堡《圣经》数百年前便开始印刷书籍；因为中国的山水画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其出现早于欧洲同类艺术数百年；许多西方人持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文化非常古老，也优于其他文化；许多中国人对此也坦然受之。但中国文化在许多方面其实是比较薄弱的，比如音乐方面的和声；而且中国文化其实也不是那么古老，如青铜时代的到来就相对较晚。可以说，中国文化迅速成熟了，其政治体系与观念、社会组织、宗教态度与实践在两千年前便达到了很高的高度。中国人有足够的理由称他们的国家为“文物之邦”。正如人们要从历史来理解中国一样，人们也需要从文化来了解中国。

为了帮助西方人了解中国，出现了很多有关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优秀著作——特别是近些年。但是，越来越多的非专业但很严肃的读者，仍非常需要一本简明、扼要、准确、全面、深入、可读性强的作品。摩顿博士的这本书，正是符合这一要求的。

这本书与其他书很不同。有些有关中国历史的著作主要关注政治、经济的变化；有些关于中国文化史的著作，则一个朝代接一个朝代地叙述，以至于将一个特定的文化发展过程分割为不同的阶段；有些关于中国文化的作品，又将中国的文化分成不同的局部。与它们不同的是，摩顿教授的作品，将历史与文化结合在一起，将其视为延续不断的、相互整合的现象。通过以年代为序的历史记叙，他将中国文化编排到不同的朝代中去，常常聚焦于一个或数个文化领域。比如诗歌就单独被放在唐代讨论，佛教则置于六朝，科技又在宋朝，小说在清朝，诸如此类。这样的话，读者就获得了一个简单却清晰、深刻的印象。山水画即是一例。很难再找到像这本书中这样的，在短短数页的篇幅中，对中国山水画的精髓作了如此深入的剖析。

随着中美两国越来越广泛的联系，希望美国公众不再限于阅读

旅行家们的记录——无论它们是多么令人大开眼界。一个人需要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才能完全地、智慧地鉴赏所见所闻。对有兴趣的学生而言,也是如此。摩顿博士的这本书,无疑将有助于这种鉴赏。

陈荣捷

达特茅斯学院,中国哲学与文化名誉教授

查塔姆学院,哲学 Gillespie 教授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思想访问教授

中文版序

西方人最早对中国文化进行深入系统的学习、研究和传介的是一批教会人士。早在明末清初时期来华的许多传教士,为了传教的目的,学习了中文,进而认识了中国文化,并为之折服。他们回国后,将中国的许多典籍译成了西方文字,第一次引起了西方知识界的强烈兴趣和普通民众的好奇心。正是在这些早期基督教传教士进行的译介工作的基础上,汉学才成长为西方学术界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在欧美各国传播开来。早期基督教传教士在汉学的兴起和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汉学研究无论在深度或广度上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学术界也随之涌现出了大批在专门领域里进行深化研究的职业汉学家。他们与早期传介中国文化的传教士们无论在治学态度或是研究方法上都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汉学的不断深入发展固然是令人欢欣的事情,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种不利的倾向,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越来越多的专家写书给越来越少的同行去看,而能够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介绍中国文化的普及读物却不很常见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发现了在当今众多的汉学家及东方学者之中,有一位传教士出身的学者,还带着早期基督教传教士的那种虔诚和执著,在孜孜不倦、兢兢业业地为向大众传播他所热爱的中国文化进行着工作。这位令人敬佩的学者就是美国塞顿荷大学的名誉退休教授摩顿博士,《中国历史与文化入门》(*China: Its History and Culture*)一书的作者。

摩顿先生原籍苏格兰,1908年出生于爱丁堡。中学时期,他曾就学于爱丁堡的梅奇斯顿堡学校。中学毕业后,他考入剑桥大学,攻读古典文学,学习希腊语、拉丁语和希腊罗马史;他的专业研究方向是

希腊哲学。由于杰出的天赋和勤奋的学习，他获得了优异成绩，于1930年毕业，取得文学学士学位。此后，他回到故乡苏格兰，又在爱丁堡大学学习神学，潜心研究了《圣经》，包括古希伯来文的《旧约》和古希腊文的《新约》，以及教会史等课程。

在此期间，他还在1932年夏天到德国马尔堡大学访学一个学期。1933年他修完学业，获得爱丁堡大学神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他旋即被苏格兰长老会教会任命为传教士，派往中国东三省传教和教书。但他来到中国之后，却获得机会，被直接派到当时北京的华文学校(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学习中文，由此开始了他与中国文化的不解之缘。半个多世纪之后，摩顿先生还怀念地追述当年的情景说：“我们当时在北京有很好的老师教我们中文。其中有一位还是清朝时期在紫禁城中御用图书馆里工作过的官员。我们学习汉语会话和阅读。后来回到满洲，我仍坚持半脱产自学中文，坚持研读中国的古籍。”在中国工作期间，由于教会与当时日本占领军当局联系的需要，他又学习了日文，并且还到日本东京去进修了两年。这为他在以后的岁月里深入研究东方文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被征调到英国皇家空军服役，担任随军牧师。直到1946年，战争结束后，他才回到苏格兰，从事教会牧师工作。与此同时，他在业余时间时常举行讲座，就中国及东亚问题发表演讲，或在英国广播公司电台上发表广播讲话。1958年，他移居美国，继续担任牧师职务。

30年代的中国经历给摩顿先生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虽然由于战争和其他原因他不得已离开了中国，他却从来没有中断过对中国文化的学习研究。战后回到英国，他又多年坚持自学，还在50岁之后重返校园，先在剑桥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随后又到爱丁堡大学攻读中国哲学及比较哲学，并以《论语》中的“君子”与西方对等的概念比较为题写作博士论文，于1964年获得博士学位。1965年摩顿先生为了潜心从事中国及东亚文化的研究和教学，放弃了教士职位，在新泽西州奥林奇的塞顿荷大学应聘，成为讲授中国及日本历史的专职教授。从此，在摩顿先生的生活里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摩顿先生改行教书不是对他原有信仰的放弃，而是一种新的追求。他在给笔者的来信中说道：“在我的一生中，我首先从事的是实际的工作，然后才有了理论上的思考和教学。我曾试图将西方文化传统的精髓，即犹太基督精神，向东方人进行解释和传播；后来，由于战争的原因，我不能再回到中国工作，便决定改变一个方向，向英美人民介绍传播中国文化的精髓。我曾经从中国的哲学、文学和艺术中吸取了那样多的精神营养，我决定要和我的学生们分享这笔财富。”摩顿先生就是这样怀着对中国及东方文化的热爱，以一个文化使者的身份走上了讲台。

在大学工作期间，他除了热心教学之外，还孜孜矻矻，笔耕不辍，撰写了几本专著。其中，《日本历史与文化》(*Japan: Its History and Culture*)一书自1970年问世以来，一直受到读者的喜爱，多次再版，广泛发行。1974年还出版了它的德译本，扩大了它的读者面。同样基于他对日本文化的了解，他还著有《日本人的生活与工作》(*The Japanese—How They Live and Work*)一书，于1973年出版。另外，他还曾被邀请参加了《世界古迹文物指南》(*World Guide to Antiquities*)的编撰工作，为该书撰写了150个词条。

1978年退休之后至今，他作为塞顿荷大学的名誉教授，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活动。除举办各种讲座之外，他还把自己在东西方哲学及当代历史等课题方面的研究成果撰写成多篇论文，发表在《苏格兰人报》、《纽约时报》及伦敦的《东方及非洲研究院学报》等报刊杂志上。1980年问世的《中国历史与文化入门》一书则更是他耄耋之年的晚成大作。

《中国历史与文化入门》一书于1980年由美国纽约 Lippincot & Crowell Publishers 出版社首次发行。两年后，由于读者的欢迎和学术界的好评，即由纽约的 McGraw-Hill 出版社刊行第二版。1986年，又有人将它译成葡萄牙语，在南美巴西发行。1995年，摩顿先生对该书进行了大量的修订和增补，由 McGraw-Hill 出版社推出第三版。作者在写书之前曾多年潜心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中年以后又致力于教学，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提笔撰写该书时,已是退休之后,可以说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他集大半生的学识、思考和经验于一书,在三百页不到的篇幅内,用凝练通俗的语言向他的读者展示了他所认识和热爱的中国几千年文明的精华。

摩顿先生治学严谨,谦虚好学。其文章的风格也一如其人。虽然在该书的序言中他谦虚地说,他的书“也有许多缺陷和不足”,但它却绝不是那种追求急功近利的草率之作。他写道:“我写这本书,曾经做了漫长的准备。我曾在中国住过几年。在北京和一些小城镇里,我和那里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在一起,往往是一连几个星期不讲英语,只讲汉语。很快地,我就被中国迷住了。我开始学习中国的哲学、艺术和历史。后来,我又多年从事教学工作,向那些对中国完全无知的西方学生传授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最后,我才决定把我一生学习、研究和工作的成果汇集成书。我希望通过这本书向人们介绍世界民族之林中这一枝独秀的文明,也希望通过它帮助人们认识充满了生机、魅力和智慧的中国。在当今世界新的政治形势下,我们已经有了更好的机会来真正认识这一伟大的人民。”

美国汉学界的学者们对该书作了高度的评价。他们认为该书极为清晰而简明地追溯了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线索,重现了中国几千年来政治、战争、科学技术、经济贸易、宗教、哲学和艺术诸多方面发展演变的主要轮廓。最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向西方人展示了最基本的中国模式,展示了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潜在精神状态。因而,该书不但对于学习东亚政治文化艺术的严肃学者有参考价值,而且对一般公众或旅游者来说也是一本难得的好书。读者从它那儿获得的不但是知识,而且还有享受;他们从中认识的是世界伟大文明中独树一帜的中国文明。塔夫兹大学国际法及外交学教授约翰·斯本生先生热情地赞扬该书“成功地为读者在东西方思想的鸿沟之上架起了一座桥梁”。

1980年问世的摩顿先生的“中国书”正是在这种时代条件下应运而生的一部著作。在众多汉学家用微观方法研究中国的时候,他用

宏观的眼光鸟瞰中国。在他的眼里，中国历史和文化是一个连绵不断、水乳交融的社会现象，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因而，他以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为线索，把文化发展的进程与之编织在一起，并以介绍文化作为全书的重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有所侧重地对文化问题进行专题介绍。例如，诗歌集中在唐朝介绍，佛教集中在六朝，科技集中在宋朝，小说集中在清朝。由于这种处理，读者在获得中国历史演变的主线的同时，又对文化的各个方面得到了简明扼要而清晰深刻的印象。作者在宋朝一章中集中介绍的山水画便是成功的一例。在短短几页之中，作者不但对中国山水画的哲学渊源、传统技法（如升高的观测点和多角度透视法）、绘画材料、欣赏方法、知名画家，甚至少数名画都作了简明扼要、深入浅出的介绍，而且还与西洋画的对应因素进行了比较，使西方读者能通过对比，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山水画，更好地欣赏这一独特的艺术。难怪美国著名学者，达特茅斯学院的中国哲学文化教授陈荣捷先生评价说，在西方学者写作的介绍中国山水画的著作中，很难找到像摩顿先生在几页的篇幅之内对山水画精神所作的那样精辟的论述和深入的分析。

由于作者心目中的读者对象是西方受过教育的一般民众，他还有意识地运用了西方文化传统中惯用的人们耳熟能详的术语、惯例和概念，对中国文化传统进行解释和对比，比如“gentleman”对比“君子”，苏格拉底对比孔子，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政治主张诠释战国时期“纵横家”的谋略，等等。正是这样，作家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引导着他的读者，从已知到未知，认识了一个闻所未闻的新天地。

李尚武

西南师大外语学院

第四版序

第四版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即原纽约城市大学布鲁克林学院，现在新学院大学的卢其敦(Charlton M. Lewis)教授，与我一起成为本书的作者。本书初版于1980年，无论是作为院校的教材，还是作为一般读者的读物，它都被广泛地接受。1984年和1995年，本书曾两度修订。24年过去了，很明显，本书的编纂需要吸收一位对2004年的中国更加熟悉的人。卢教授欣然同意用新的材料来更新本书的最后几章，也对前几章作了一些修正。他从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学位，长期致力于中国、日本的研究、教学、写作，这使得他极为胜任这一工作。他所做的新的、带注释的参考书目，则特别有用。

我在第三版序中说，本书将大致平等对待中国史上的所有时期，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为了增加一些必要的新材料，我已经不再能做到平均分布重点了。但是，在新版中，面对这块迷人的土地，我们仍试图将现在与过去联系起来，在持续不断的文化史中追踪种种变化。

斯科特·摩顿

2004年夏于纽约

致 谢

本书源于我很久之前的生活和思考。我对很多人的感谢之情难以言表,包括我的家人、朋友,还包括我在中国北京和东北地区那段快乐日子中的老师们,以及最近塞顿荷大学历史与东亚研究系的同事和学生们。

在曾对本书写作提供宝贵帮助的人之中,我特别感谢陈荣捷教授的慷慨和支持,他不仅写了前言,提出了修改意见,而且我早年在美国的时候给了我鼓励。Annette Juliano 扩展并提高了我关于中国艺术的想法,并把我介绍给各收藏家和博物馆,还将她自己所藏的照片提供给我。Ezekiel Schloss 夫妇,则好心地向我开放他们收藏的珍贵陶瓷塑像,并允许我利用那些在其他地方难以获得的丰富图片。顾洛阜(John M. Crawford, Jr.)则最慷慨地向我开放他关于中国书画的杰出收藏,且与我进行了愉快而难忘的谈话,指点我哪些例子最适于一部中国文化简史。东京的三井高遂大方地让我使用一张他个人收藏的图片。塞顿荷大学的 Paul Tsai 教授也为我提供了图片。Marge Lin 则热心地为我题写了书中用到的汉字。

在本书初期计划的时候,剑桥大学东方研究系的 Michael Loewe (鲁惟一)是对我帮助最大的。

再也没有比与 Hugh Rawson 一起工作更愉快的了,他两度作为我的编辑。在此,向所有人表示感谢。但对于书中的观点由我本人负责。最后,我最感谢我的儿子 Keith Scott Morton,他发挥专业水准创作了英文封面图片和其他许多图片。

斯科特·摩顿
布鲁姆菲尔德学院,新泽西
1980年1月

这一平装本中,有些内容作了修正和改进,特别感谢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傅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的帮助。

斯科特·摩顿

纽约,1981年秋

导 言

对普通的西方人而言,远自马可·波罗,中国一直是一个神秘而迷人的国度。自从 19 世纪以来,中国被迫对外打开国门,这层神秘的云彩从此开始消散了,不仅仅是欧洲和美洲,几乎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对中国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出于三个主要原因,新中国受到了西方模式、文化、科技的深刻影响。首先,在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是世界性过程的一部分,它同样发生在其他所有的地方;因为所有的国家都在或多或少地采纳西方的方法体系,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观念。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自 1911 年以来,长达 80 余年的政治与社会革命历程的顶点,这一革命甚至早在 19 世纪中期便受西方贸易、技术的冲击而引发。第三,今日中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为西方所影响,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源于法国大革命、卡尔·马克思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里的著作及俄国革命。共产主义,最初是西方的产物。

如果一个学生对现代中国的了解始于毛泽东,或孙中山,或更早的 1839 年鸦片战争,那么这是不是就足够了呢?无须深思,这一反问的答案必然是否定的。尽管西方影响了现代中国,但抛开其久远历史的几个主要阶段,这个民族是不可能被理解的。我们这里关注的是一个自豪的且基本自足的文明进化的过程。今日中国人的态度,从很大程度上说,植根于其历史,而且他们有意将这段历史呈现在自己的意识中。

中国历史也许并非世界上最悠久的。有记载表明,尼罗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甚至印度河流域,都存在过早期文明。但是,在其他早期文明的中心,种族和语言的变化使得它们面目全非。相比之下,中华文明从本质上来说仍清晰可辨,因此也成为现在世界上最古

老的持续发展的、同质的主要文明。

这一事实经常会导致一种假象，即中国的历史是停滞的，清朝末期那种被动、停滞的景象是整个中国历史所共有的。这与事实相去甚远。过去的若干个世纪中，曾发生过无数的变化，有些是剧烈的，而且很多是革新性的。但即使历经了如许变动，包括与西方接触而引发的一系列变动，中国人及其语言，还有其文化难以定义的本质，都保留了某些始终如一的特征。

那么，这本小书如何涵盖这些变化与不变？显然，首先有必要向读者提供一个大致政治框架，然后再将中国历史上主要的文化和趋势纳入到这个框架之中。

政治框架一般以朝代划分。传统上，中国历史学家以儒家的道德说教来看待中国历史。它是家族史，即家族在历朝历代的传承；它是个人的履历，即处于专制政府金字塔顶端的统治者及其官吏的特征。这样的话，王朝的创始人被看做好的，王朝先是兴起，最终则由于道德败坏而衰落，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会被视为恶魔。新的王统出现了，有时是顺应民心的结果，有时则是外族征服的结果（其本身可能被视为中原统治者道德失败的结果）。

大部分中国历史确实可以自然地以朝代分期。但现代历史学家也看到了其他起作用的因素：社会与经济变动、外族威胁，多伴随王朝始终，导致王朝衰落，而且产生了下一个王朝的政治形式。因此，这些因素也会成为历史分期的标志，即从新的因素开始影响事件的过程，到它们的作用消失为止。其起点与终点，也许与王朝的起止并不一样。比如，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有一些重要的变化标志着中国历史从中世走向近世，但是这些变化却不是发生在唐宋两个朝代之间，而是发生在755年的安史之乱前后，距唐朝灭亡还有一百多年。尽管如此，完全熟悉王朝的名称、时间仍是必要的，因为这些被用作整个中国历史的参考点，对政治史和文化史都适用。

中国文化史包含非常丰富的资料，因此这里不可能对每一种艺术、文学形式，或者文化表现形式的起源、兴起作全面探讨，而只能以

时代先后,在其高峰的时候,就每一种形式提出一些简短的思考。在唐代提及诗歌、在宋代提及山水画,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代没有伟大的诗人和画家,也不比将司各特(Walter Scott)和雨果(Victor Hugo)视为浪漫主义小说的鼻祖和殿军意味更多。

科学史需要专业知识。一般的历史则应致力于将一个民族的发展历程尽可能地以整体形式呈现出来,不应将其分割为不相关联的部分,比如宪政史、军事史、经济史、社会史、艺术史等。除非我们将眼光投向亚洲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我们割裂地理解历史的程度,很少被意识到。中国学者并不将他(中国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学者”都是指男性。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如女史学家班昭,但她们为数极少。儒家将女性限制在家内。)自己视为专门之士(孔子说:君子不器),而是一个全面之士。他不但要求自己精通为政之道——作为官僚体制的一员,这是其主要工作;而且要求自己有书法、绘画方面的素养。他可以将自己定义为一个音乐家、诗人及散文家。他所受的训练包括射箭,也要知道一些兵法,因为他作为地方官员的职责包括了民政和军政两个方面。因此,在介绍中国历史的时候,无论多么不充分,仍有必要提及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的的所有重要因素的一些侧面。

将如此多样的材料压缩到可读的短短篇幅中,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有些短篇幅的中国史,仅重视现代的事情,而对过去则只提供一个大概。其他的一些则细致地记述帝制时代,对国共时期的中国革命却没有应有的重视。这本书试图大致平等对待所有的时代,坚信每一个时代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有各自的重要性。

任何国家的事情都可以被记录,任何社会的趋势都可以被审视,而且这些是以对所有人而言明白易懂的语言来表述的。但是,对中国历史的解释,若既要讲得通的措辞,又要澄清一些深层的困惑,给西方人一个清晰的印象,却是一个难以应付的挑战。对西方人而言,中国人、其动机和处事的方法,都是很难理解的;正如中国人肯定也难以理解我们和我们无意识的预设一样。理解的最好方式就是在另